

冀东日伪政权

南开大学历史系 合编
唐山市档案馆



档案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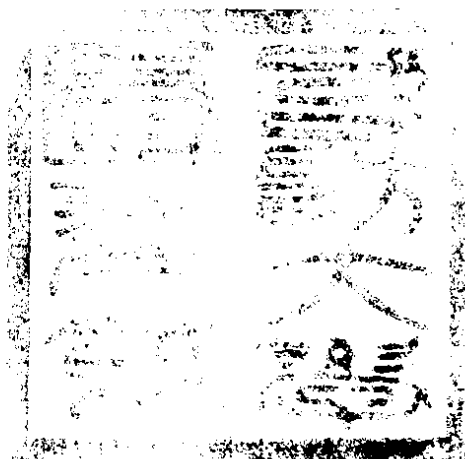
2 031 2587 6

冀东日伪政权

南开大学历史系

唐山市档案馆

编者：张洪祥 高德福 张励声



档案出版社



责任编辑：顾松林

封面设计：吴丽珠

冀东日伪政权

南开大学历史系

唐山市档案馆

档案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印刷一分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9.5 字数506千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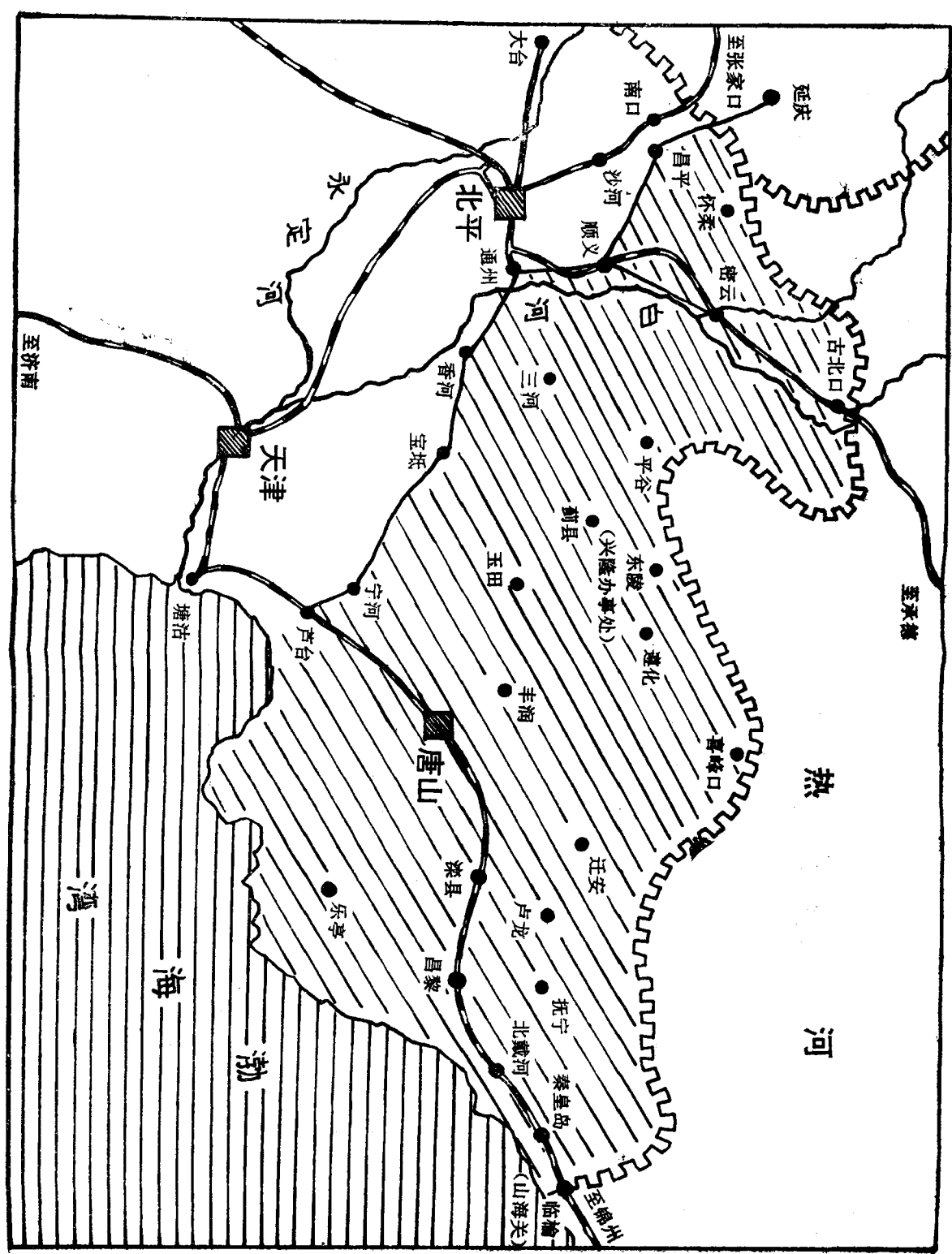
印数1—1000册

ISBN7-80019-318-7

K·84 定价：15.60元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行政区域示意图

(1935年至1938年)



编者说明

冀东日伪政权，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关内扶植建立的第一个傀儡政权。1935年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此，冀东的通县、怀柔、顺义、昌平、平谷、三河、香河、宝坻、宁河、蓟县、玉田、丰润、滦县、遵化、迁安、卢龙、昌黎、乐亭、抚宁、临榆、兴隆、密云等22县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冀东日伪政权统治长达10年之久，前后共分为两个时期：（一）1935年11月至1938年1月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时期；（二）1938年2月至1945年8月为冀东道和冀东特别区时期（在行政上已属于伪河北省政府管辖）。在此期间，日本侵略军及其走狗汉奸蹂躏了冀东人民，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如1941年1月25日，日本侵略军血洗丰润县潘家峪村，一次杀害了村民1237人，烧毁房屋1100多间；1942年12月5日，日军又制造了滦南县潘家代庄惨案，杀害村民1128人。同年，日军又在冀东境内沿长城一线制造“千里无人区”，施行“集家并村”政策，把所有村民赶到日军控制的“人圈”（即集中营）。仅遵化县境内“无人区”面积达288平方公里，落入“人圈”的人口有4600多人，在“无人区”惨遭杀害的有1200多人，沿长城一线的112个村庄全部变为废墟。在日伪统治时期，日军暴行不计其数，据档案资料统计：仅迁安、丰润、滦县、乐亭、遵化等县，被日军直接杀害和虐待致死的就有81000多人。另外，日伪政权还通过保安队、新民会、警察署、自卫团等各种反动组织，对广大群众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使整个冀东成为一座人间地狱。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冀东的历史，后人是不应该忘记的。

编辑《冀东日伪政权》一书的目的，就是要集中与当年伪政权有关的档案、文献、报刊等资料，揭露和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在冀东所犯下的罪行，并供给史学工作者和科研部门研究参考。

本书所选用的资料，仅仅是当年冀东日伪政权遗留下来的罪证中的一少部分，但仍可以使我们清楚地了解这个伪政权怎样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疯狂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本书资料来源，大部分是原始档案，包括伪政府公报、月刊、公牒文件、来往函电、会议记录等等，由唐山市档案馆提供。同时，为使本书内容更加充实，我们还收录了部分当年报刊上的有关资料以及解放后一些单位和个人所整理的史料。凡解放后所整理的史料，一般都作为附录，安排在有关专题的后面，供读者研究参考。本书的内容编排，按问题性质分为九个部分：（一）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成立与合流；（二）冀东道与冀东特别区；（三）冀东保安队与警团；（四）冀东武装走私；（五）冀东新民会活动；（六）强化治安与保甲制度；（七）冀东伪政权的财政与税收；（八）冀东沦陷区的经济；（九）奴化教育与反共宣传。有些部分内容较多，其中又分为若干专题；同一专题的资料，则按历史年代的顺序编排。为便于阅读，我们在每一部分开头都加了按语。

本书编者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师张洪祥、高德福、经济系教师张励声，参加书稿讨论修改的有唐山市档案馆刘乃雄、刘兴泉、吴焕发等同志，最后由张洪祥编审定稿。此外，南开大学历史系八二级毕业生吕华林、江沛、曾瑛、王丽芳、韩玉霞、王会娟、刘红娟、于学蕴、谭兰英、吕烈敏、邢富华、李毅峰、杨阳、张昱、刘志丰等，参加了本书最初的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室宋志勇，担任了本书部分外文资料的翻译工作。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唐山市政协、河北省档案馆以及通县、遵化、丰润、滦县、昌黎、玉田、乐亭等县档案馆和党史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史料编排中的缺点和错误，希读者批评指正，以期修订。

编者

1989年12月

前 言

——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1935年底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宣布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傀儡政权。从它产生，到1938年初同伪华北临时政府合流，都是由日本特务机关一手导演的。冀东伪政权的出现，为日本侵略华北和全面进攻中国，提供了有利条件，给中华民族、尤其是冀东人民带来沉重灾难。

—

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我国东北后，又立即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

当年华北包括冀、察、绥、晋、鲁五省和平津两市地区，在我国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这一地区的丰富物产资源和广阔市场，早已为日寇所垂涎。当年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曾直言不讳地说：“满洲市场已臻饱和，短期内亦难再行扩大，即不能与帝国生产率之增进相调和”。“华北……在我帝国有计划之指导与经营下，则原料与生产量能增加三倍，民众之消费能力亦自能大为增进。故华北，诚为帝国之最好殖民地”。^①因此，1933年初，日本关东军以四个师团兵力加上伪军共十万人，发动了对华北的侵略战争。1月3日日军占领了山海关，2月底至3月初又武装占领热河省。接着，日军越过长城，侵入河北省冀东地区。在民族危亡关头，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

^①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第46页。

策，使战场一败涂地。同年5月日军已先后占领密云、通县、唐山、宁河等地，进一步威胁平津。国民党政府为了苟安，竟然放弃抵抗，请求停战，并于5月31日同日本关东军签订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是一个屈辱的卖国协定。其内容是日本关东军事先拟好的。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政府不仅默认了日本侵占东北、热河的合法化，而且使日本获得了长城以南地区的支配地位，长城各口脱离了中国的管辖，平津以东的冀东地区成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在这一地区驻扎。这样，不但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与华北连接的咽喉地带置下了有力的据点，使华北门户洞开，随时可进占冀察，夺取平津；而且也为后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塘沽协定》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策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此以前，日本对东北、热河等地的侵略都是武装军事占领；而在此以后对华北的侵略，则变成了以“政治谋略”为主，即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借以分裂中国，侵吞华北。这时候日本侵华策略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第一，日本同英、美、苏之间矛盾的加剧。自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其政界、财界、军部都有一种“焦躁感，孤立感。”^①特别是1933年至1935年间，日本与英美的关系有日见恶化的趋势，如1933年4月，“日印商约”取消，6月东非英属增高日货入口税，1935年英国施行日货倾销税等；美国海军也在扩造军舰。当时中国华北为英美势力范围，如果日本武装占领华北，进一步损害英美在华利益，必加深同英美的矛盾。而苏联感到日本关东军的威胁，自1932年开始，在东部边境大量增兵，并构筑了坚固的国防工事。因此日本关东军“痛感对苏国防的危

^①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五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22页（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

险”，急需在伪满边境部署兵力，无奈兵力不足，对华北只能依靠“政治谋略”。

第二，日伪在东北统治不稳固。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到1935年初，在北满、东满和南满等地先后建立了七支抗日军，人数达五万人之多。英勇的东北抗日军民，在广阔的东北大地上，到处袭击敌人，动摇着日伪的统治，大大牵制了关东军的兵力。

第三，日本的战争物资准备不足。到1933年，日本仅有十二家飞机厂，年产飞机发动机二千台左右，而陆军中的飞机不足一千架。汽车年产仅二千二百余辆，大量军用汽车还需进口。坦克年产三百八十辆，钢产量约三百万吨左右。显然，这些战略物资还不足以应付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需要。而且这时候一些极端法西斯分子还未能完全控制日本上层政权，政界和军界在侵华策略上也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些都需要时间去进行和调整。

第四，受到李顿“国联调查报告书”的影响。1932年李顿调查团关于中国东北问题的报告书中曾建议，在东北地区建立一国际共管、由日本获得实益的自治政权，以适应东三省的“特殊环境”。这时日本军部认为，塘沽协定以后，河北三分之一的县份已造成“特殊形势”。这种“特殊形势”也可适用于整个华北；而列强各国和中国政府既已赞同东北自治于前，则不能反对华北自治于后。

日本侵华策略的这一变化，在1933年10月20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的“帝国外交政策”中体现了出来。11月30日，陆军省对上述“帝国外交政策”的最后修正案中明确提出要“支持中国大陆之分治活动，驱逐国民党势力于华北之外”。^①1934年4月，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假借所谓“华北人民爱国协会”的名义，向关东军参谋本部提出了一个题为“挽救华北的政策”的文件，主张即速在华北建立一个亲日的新政权。1935年9

^① 张蓬丹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224页。

月28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了川岛相提出的“鼓励华北自主案”，训令关东军执行，以此“分离华北”乃正式成为日本“帝国政策”的一部分。其办法，就是要在华北制造所谓“自治运动”。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说，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在内蒙以外的华北地区制造自治政权”。“在华北是要使这五省脱离南京政府，建立一个在日本领导下同‘满洲国’有密切关系的特殊区域，从而削弱南京政府对这个区域的影响和消除对‘满洲国’的威胁”。田中隆吉还说，在起草文件过程中，“我们感觉到在发动这个自治运动中，尚缺少一个明确的动机，因而感到困难。后来经坂垣、土肥原和佐佐木研究后，乃选择‘反共’这个口号作为树立‘华北自治政府’的目标。这个令文经东京批准后，土肥原即衔令去北平”。①

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自治”实际上是以1935年4月开始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以后，他们更明目张胆地加紧了这项活动。最初担当这个任务的主要是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由日本特务机关予以配合。一开始他们瞩目中的人物是原北洋军阀巨头吴佩孚和孙传芳，失败后转向了华北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即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山西绥远绥靖主任阎锡山等。9月24日，多田骏曾发表声明，提出：（一）华北五省，应结合成一联合自治政权；（二）受日本之指导；（三）彻底扫除反满抗日分子；（四）建立经济独立单位；（五）与南京政府财政绝缘；（六）联合五省实力，共同防赤；（七）吁请华北人民速起倒蒋自救。为把这些实力派人物拢在一起，多田骏及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桥等，分别对宋哲元、商震、韩复榘和阎锡山展开了工作。但是宋、商、韩、阎四人均对此冷淡敷衍，因此多田骏的策动工作未能奏效。

华北驻屯军“分离华北”工作进展缓慢引起关东军不满。1935年10月13日，关东军召集驻华各地武官及多田骏等，在大连

① 《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247页。

举行会议，再次确认“分离华北”的方针。会后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正式把土肥原派往平津，以推进华北自治。

土肥原，1891年8月1日生于日本冈山武士之家，自幼学军事，自1907年12月被派到中国张家口从事谍报工作开始，先后十次到中国，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达二十余年，号称“中国通”。实际上在他正式被派到华北之前，早已开始了这项活动。策动吴佩孚就是他的主张。当多田骏策动宋、商、韩、阎在华北联合建立“自治”政权的阴谋失败后，土肥原又曾积极设法邀请宋哲元和商震在北平聚会，商讨宋、商协力建立新政权问题。但宋、商二人态度暧昧不明，敷衍搪塞。最后土肥原把策动的重点集中到宋哲元身上，企图逼其就范。

当时宋哲元担任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兼平津卫戍司令，在华北有较大实力。日本侵略者认为，宋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并参加过冯玉祥的倒蒋运动。“张北事件”后，又被蒋介石免去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对蒋不满。因此他们把宋哲元看作实现“华北自治”的最理想人物。土肥原9月在北平时，已要求宋哲元组织自治政府。关于这时候土肥原策动宋哲元的情况，当时任北平市长的秦德纯在战后远东国际法庭有如下一段证词：“1935年在宋哲元担任平津卫戍司令（即9月21日一引者）后，土肥原曾多次到华北来，煽动组织华北自治政府，使华北脱离中央。他向天津市长肖振瀛提出：（一）宋哲元应通电全国，宣布华北自治政府的成立；（二）当时留在华北的中央政府宣传人员必须从华北撤退；（三）平津地区的舆论应予控制，任何反对自治运动的言论必须制止；（四）日本支持宋哲元为华北自治政府的首脑；（五）日本将扩大对华北的军事和政治援助。威胁利诱，双管齐下。……后来，土肥原和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及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又把这些要求向宋哲元和我本人当面正式提出，但是我们没有同意”。^①

^① 《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248—249页。

11月11日土肥原再次来到北平，向宋哲元施加了最后压力，要他立即成立“华北五省防共自治政府”。11月18日，土肥原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宋于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土肥原扬言，“如果华北不宣布自治，他准备派五师团到华北，六个师团到山东”。^①

土肥原一面公开向宋哲元提出强硬要求，一面暗中策动“自治”的请愿与暴动。10月6日，吴佩孚旧部白坚武在天津日租界内组织“华北自治救国军”阴谋暴动，宋哲元立即宣布戒严，才得免于祸乱。11月20日，日本特务又利用所谓“民众倡导自治”之名，策动香河县劣绅武宜亭等，制造了中外瞩目的“香河暴动”。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操纵的所谓“民众团体”，如姚提昌的“华北人民急进会”、钱崇澍的“华北人民自救会”等，莫不以“自治”为口号，游行街市，并向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和津沽保安司令部请愿。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为配合和支持土肥原的行动，于11月12日命令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长，率领独立步兵一联队，轻战车一中队、野战炮兵一大队、工兵一中队，于15日到达山海关、古北口附近集结，作好进军华北的准备。16日，命令空军六个中队，集结于山海关、锦州地区，作好20日进驻北平地区的准备。同时还命令旅顺、青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各一艘，开驶大沽口。以陆海空三军的示威，逼迫宋哲元就范。

当日本东京得知宋哲元一派可能在11月20日发表自治宣言时，18日，陆、海、外三相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并电示各派出机关：“有吉大使于19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准许华北的某种自治，并告诫当华北发生纠纷时，对中央军北上，帝国决不默视。”^②11月20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会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提

^① 《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248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五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第50页。

出了上述要求和警告。

此时的宋哲元，虽然与蒋介石有矛盾，并有在华北扩展自己势力的欲望，但是基于民族感，他不愿叛国投敌，充当汉奸。因此，当18日土肥原向他提出最后通牒后，19日宋急电南京请示。当天下午，蒋介石电令宋哲元停止与日本谈判。于是宋哲元令肖振瀛将蒋介石的电示转告土肥原，而他自己却于20日晨悄悄离开北平，避居天津，致使土肥原11月20日成立“华北五省防共自治政府”的计划完全落空。

土肥原策动宋哲元等实现“华北自治”的阴谋破产后，则全力扶植早已看中的国民党滦榆兼蓟密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

土肥原想以冀东二十二县揭起“自治”旗帜事实，以便向日本军部复命。冀东伪政权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二

1935年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这个伪政权由土肥原亲自策划，但具体筹办工作则是由日本在天津的特务机关“青木公馆”^①进行的。土肥原所以选中殷汝耕充当日本傀儡，是殷同日本帝国主义早有勾结，并认为“殷是一个通晓日本情况的人”^②。殷汝耕，浙江平阳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娶日本女子井上慧民为妻。1916年回国，先在北洋时期的国会中任秘书，后转南方军政府任驻日特派员。1925年，他参加了郭松龄反奉事件，任反奉军外交处长，负责对日交涉。同年12月，巨流河一战，反奉军失败，郭松龄夫妇遇难，殷只身逃入日本驻新民县领事馆，请求保护，始得活命。关于殷逃入日本领事馆的情况，当年日本驻华外

① “青木公馆”，是土肥原派遣大迫通贞中佐在天津设立的特务机关。主要任务是收买汉奸，策划冀东“独立”和华北自治运动。

② 《土肥原秘录》第41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交官森岛守人有这样一段记载：“当大正十四年（1925年）郭松龄倒戈时，殷作为外交部长（实际上是外交处长）而活跃于政治舞台上。失败后，他不得不逃亡到辽河畔新民屯我总领事馆避难达数月之久。由于奉天总领事吉田富有人情味，妥善安排，在黑夜里才使得他得以逃出东北军的重围”。^①殷从此以后，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安插在中国政府内部的暗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殷投靠国民党蒋介石，在亲日派黄郛手下当秘书。1923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杀害中国军民六千一百多人，伤一千七百余，市民财产损失达二千九百多万元。当时，殷负责对日交涉，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1933年，黄郛出任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殷随同北上，参加卖国条约《塘沽协定》的签订，后出任蓟密区督察专员兼滦榆区督察专员。在任职期间，“他早就接受了关东军的领导和各种援助”。^②所以，1935年土肥原同他密商组织冀东伪政权时，“殷汝耕不仅同意，而且表现出乎意料的决心”。^③同年11月23日晚，殷汝耕和一批汉奸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旅馆中聚会，策划“冀东独立”问题，土肥原等一伙日本特务也参加了会议，“亲临指导”。据土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证词说：“在殷汝耕发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的前夕，我和土肥原来到天津某一饭店，那里已聚齐了殷汝耕以下的主要人员，土肥原要求他们起事。意气高昂的殷汝耕立即说：‘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新政府成立，今天晚上我立即返回通州’。土肥原大为高兴，让我马上去拿香槟酒，并说：‘那么我们就以香槟酒举杯预祝成功吧！’”^④殷汝耕公开投靠日寇，甘心当“儿皇帝”，使华北政局更加动荡不安。

11月24日，殷汝耕返回通县后即通电全国，公布冀东二十二个县《自治宣言》，声称：“国民政府施政已历八年有余，其间

① 森岛守人《阴谋、暗杀、军刀》第13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③④ 《土肥原秘录》第41页、43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多为专政党利计，毫无善施，秕政有出不符民意。我等于兹应奉孔子之道，以谋实现新乐土。……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举联省之先声，以谋东亚之和平。”^① 同一天，殷还给国民党华北军政界要人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徐永昌、傅作义、秦德纯等人去电，要求他们“宜定大计”，投靠日本，实现“华北自治”。由于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华北自治，加上国民党地方军阀为自身利益计，都“不愿做殷汝耕应声虫”，殷企图联合华北各省市“共同自治”计划，遂告失败。

25日上午，殷汝耕在日本关东军的武装保护下，于通县孔庙召开“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会，宣布委员会由殷汝耕、池宗墨、王厦材、殷体新、张庆余、张砚田、赵雷、李海天、李允声等九人组成，殷汝耕为委员长。委员中前四人，是原蓟密区专员公署官员；后五人是冀东五个保安队的队长。会上，还宣布了伪政权的组织机构：秘书长池宗墨；外交处长霍实，后改为王润员；民政处长张仁蠡；财政处长赵从懿；秘书处张仁蠡兼，后改为陈曾栻；建设处长王厦材；教育处长王厦材兼，后改为刘云笙；保安处长董凤祥，后改为刘宗纪；实业处长殷体新。（同年12月25日，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实业等处，均改称为厅。）在这批人员中，政治态度不完全一样。一部分亲日反共的骨干分子，早已同日本特务机关建立了联系，决心叛国投敌。如池宗墨，浙江平阳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明治大学，同殷汝耕是“莫逆之交”。1935年初，通过殷的关系，出任蓟密区专员公署秘书长。他同关东军土肥原和通州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来往密切，积极鼓励冀东“自治”，后来成为冀东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又如张仁蠡，河北南皮县人，原丰润县县长。他是清末大官僚张之洞次子，其兄张燕卿（名仁乐），北洋时期官僚，“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关东军，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外交部长和实业部长，是著名的汉奸。张仁蠡任丰润县长时，“生心向外，

^① 《满洲报》1935年11月26日。

早有叛意”，故得到土肥原和殷汝耕的信任重用。殷体新，是殷汝耕的胞弟，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生，原蓟密区专员公署秘书。在策划冀东“自治”过程中，来往于平津和通州之间，经常出入日本特务机关，是冀东伪政权的骨干之一。伪政府成立时，他任实业厅长并兼任伪政府驻唐山办事处主任。陈曾栻，河北青县人，原滦县县长，也是日本明治大学的毕业生，他参加伪政权，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达到高官厚禄的目的；同时，还因为他任县长期间，“一度遭省府撤任，殷汝耕抗命留任，此际确为感恩图报耳”。^①赵雷、李海天、李允声等，原“满洲国”伪军李际春、石友三部属。1933年随日本关东军侵入冀东，后驻扎在唐山、滦榆等地。勾结当地土匪，鱼肉民众，成为当地一大祸害。1934年被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收编，改为“冀东保安队”。事实上，这些伪军头目早已被日本收买。殷汝耕宣布冀东“自治”，首先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响应。

在冀东伪政权中，也有少数人不甘心附逆，持观望态度，以便等待时机，逃出伪区；有些人则得到国民党军政要人的默许，暂时留在伪政权中，虚与委蛇相机行事。如保安队长张庆余和张砚田，原是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的两个团长。1935年初，奉命改编为两支冀东保安队，分别进驻通州、香河、宝坻、玉田、丰润、顺义、怀柔、密云、三河、蓟县、石门、遵化、抚宁一带。殷汝耕策划冀东“自治”时，张庆余、张砚田曾秘密请示河北省长商震（此时于学忠已调任陕甘）如何行动？“商密告示：目前不宜与殷汝耕决裂，可暂时虚与委蛇，余当负责向政府陈明”。^②同年，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张庆余和张砚田又密请张树声^③介绍会见宋哲元。宋对他们说：“素悉

① 《中央周报》第392、393期合刊，1935年12月6日。

② 张庆余《冀东保安队通县反正始末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1982年。

③ 张树声，字俊杰，河北沧县人。河北省哥老会首领之一，原国民军冯玉祥部下，任过国民一军骑兵师师长，察哈尔军务邦办。

二位热爱祖国，近又听俊杰（张树声字）兄说，二位愿合力抗日，本人代表政府表示欢迎。兹有一事，兹先向二位声明，请二位注意，即我，宋哲元决不卖国，希望二位以后对我不要见外，并望坚定立场，不再动摇。”^①临别时，宋赠他们每人各一万元。从此，张庆余、张砚田留在伪政权中，等待时机，发动政变。又如冀东伪外交处长霍实，原蓟密区专员公署古北口办事处主任，参加了伪政权的成立大会。但他不甘附逆，于1935年12月28日逃出伪区，由保定转南京，向国民政府汇报伪政权情况，并通电声明脱离冀东伪政权。

殷汝耕叛国投敌后，国民党政府于11月26日通令缉拿汉奸殷汝耕，撤销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一切职务由河北省府处理。但迫于日本侵略军压力，国民党不敢采取行动，仅仅发表了一张“通缉令”的空文。

冀东伪政权的成立，使通州、怀柔、顺义、昌平、密云、平谷、三河、香河、宝坻、宁河、蓟县、玉田、丰润、滦县、遵化、迁安、卢龙、昌黎、乐亭、抚宁、临榆、兴隆等二十二县，逐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冀东各县是河北省的富庶地区，其面积有八万平方公里，占河北省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八；人口为六百五十万，占河北省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耕地面积为一千三百万亩，占河北省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三。据统计：小麦年产量为二亿七千万斤，小米为四亿斤，玉米五亿斤，大豆三亿斤，棉花二千余万斤^②。其农产品数量，在华北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另外，冀东的地下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如开滦煤矿，是关内仅次于山西的第二大煤田，每年产量五百万吨左右，距海口很近，海上、陆上运输都很方便，是国内各工业区主要的燃料来源。滦县和临榆两地铁矿储藏量约三千三百万吨；兴隆、昌平、

① 张庆余《冀东保安队通县反正始末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1982年。

② 金曼辉《我们的华北》第206—207页，1937年版。